

# 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 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程虹 高诗雅

**摘要：**作为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成功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自然试验场景。通过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本文发现：尽管市场经济的“制度红利”、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红利”均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但二者难以单独发挥作用。只有当“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叠加时，才能引致经济发展质量的持续提高。综合运用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长时段跨国数据，本文以GDP、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速变化作为衡量指标，就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动力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实证分析表明：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低位震荡逐渐转向平衡增长，资源配置效率、经济结构逐渐趋于优化，开放效应与学习效应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日益凸显。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新中国70年；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动力机制

## 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史中，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自然实验场景。1949—1978年之间，中国经济的人均GDP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32美元增长至1978年的371美元，近30年时间增长仅1.8倍，年均增速3.6%，显著低于世界同期4.8%的年均增速；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人均GDP则从期初的371美元快速提升至2018年的9633美元，40年时间增长26倍，年均增速高达8.5%，较世界同期2.9%的增长率水平高出5.6个百分点<sup>①</sup>。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中国经济为何在前30年长期陷入“马尔萨斯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长期停滞，而又为何能在后40年爆发出强劲的增长动能，迅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这种惊人的结构性变化的背后，留给经济学家的是无限的思考空间。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上述结构性变化，现有文献多从制度变迁、比较优势与外部环境变化等角度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解释。一方面，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学者们研究发现：在1949—1978年间，中国经济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30年陷于长期的增长停滞，与当时领导人所采取的结构主义发展战略存在较为显著的因果关系（汪海波，1999；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丁冰，2009；林毅夫，2019）。在结构主义的发展思路下，中国经济采取了一条政府主导发展重化工业、通过进口替代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经济机理是，通过政府主导以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问题（Keynes，1936），通过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实现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的快速赶超（Lewis，1954；Rosenstein-Rodan，1956；Rostow，1960），通过进口替代获得快速工业化所亟须的资本积累。然而，由于上述发展战略选择

\*程虹，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宏观质量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电子邮箱：919637855@qq.com；高诗雅，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宏观质量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编号：15JZD02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ZDA045）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sup>①</sup>为便于时序分析和跨国比较，本文将人均GDP按2017年不变价格美元进行了调整。

忽视了投资-消费、内需-外需的均衡关系,“大推进”的结构转型反而引发较为严重的结构失衡,造成经济发展长期陷入停滞。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摒弃了结构主义的发展战略,逐步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农业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Young,1998;Zheng et. al,2009);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人力资本、劳动力从低生产效率国有部门向高生产效率私营部门的转移,以教育回报率为衡量标准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逐渐提升(Bai et. al,2010;Zhu,2011;Li et. al,2012);通过出口导向型(Export-Led Growth)发展战略、双轨制价格改革(Dual-Track Price System)、乡镇企业(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TVEs)的“红帽子”改革(TVEs with Red Hat)等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Fung et. al,2006;Rodrik,2006;Blecker and Razmi,2010;Alder, Lin and Zilibotti,2016;Lau et. al,2000;Lin and Yao,2001)。现有文献认为,上述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战略有效解释了新中国成立成立以来后 40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Yao,2014)。此外,大量实证研究则发现,官员晋升考核从政治导向转向 GDP 导向、财政分权等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是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制度性因素(Li and Zhou,2005;Yao and Zhang,2011;Qian and Weingast,1997)。

另一方面,除制度变迁视角之外,部分文献还从比较优势、外部环境变化、经济增长要素的结构性变化等维度出发,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 70 年间所呈现的长周期变化。其中,现有文献发现,人口转型能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前 30 年的“低速增长”、后 40 年的“增长奇迹”提供一个有效的边际解释(Cai,2010;蔡昉,2013;Li et. al,2012,2017;Bloom and Finlay,2009)。20 世纪 40—70 年代,中国经济的人口积累模式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入“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 30 年中国经济的人口抚养比不断增长。由于高人口抚养比将造成消费支出压力长期居高不下,人口形势的严峻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产生冲突(Peng,2011;Hesketh, Lu and Zhu,2005),对资本积累与长期经济增速构成负向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 年成为“一胎化”政策的起始年(Schultz and Zeng,1995;Wang,2012),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积累模式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转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既引致中国经济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渐趋凸显,又促使中国经济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要素逐渐丰裕<sup>①</sup>。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私营非农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日渐增强,人口转型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交叠效应,有效助推了改革开放以来 40 年间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此外,部分文献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加快转移,这激发了中国这样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后发优势(Gerschenkron,1962;Morris,2011)。依托对外开放、出口导向型增长等发展战略,中国大力吸引 FDI 发展加工贸易,FDI 净流入、货物贸易出口占全世界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左右分别攀升至 2010 年的 13.1%和 9.9%;外生先进技术的扩散与吸收,有效推动了中国效率对于世界前沿面的快速追赶。较近的经验证据发现,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外部发展环境改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由于出口成本下降,中国出口企业绩效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平均占比从 1997—2002 年间的 54%增长至 2008 年左右的 60.6%(Koopman et al,2012)。进一步地,部分研究表明:加入 WTO 之后进口关税的下降,对中国非出口企业形成了显著的“倒逼”效应,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国内非出口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并将更多要素投入自主创新以实现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Brandt et. al,2017;Wei,Xie and Zhang,2017)。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有文献从制度变迁、比较优势与外部环境等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年间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做出了诸多有益的理论探索,但也存在如下不可忽视的局限性。首先,从研究视

<sup>①</sup> 从生育性别偏好角度,部分文献研究了人口转型对于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其他微观机制(Wei and Zhang,2011a;Wei and Zhang,2011b)。上述研究发现,由于传统文化中对男性的生育偏好,随着人口转型期生育子女机会成本的增加,中国出现更为突出的“剩男”现象。为增加男性后代在未来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生育男性的家户将进行更多的储蓄-投资行为,并且创业概率更高;这也是造成人口转型期中国经济高储蓄率、高创业率的一个重要微观原因。

角上,现有文献多将制度变迁、比较优势与外部环境等因素分隔开来进行研究,忽视了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一方面,如果说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在当代经济史之中,为什么日本在市场经济体制、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就陷入了“失去的30年”?这背后,日本“人口红利”衰减、老龄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如果说以“人口红利”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劳动力要素一直以来较为丰裕的中国,其“人口红利”要素在19—20世纪初甚至更为明显,其经济增长的起飞却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实际上,从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国的发展历程上,我们也能观察到:经济发展即使具有“人口红利”的潜在优势,没有“制度红利”也将造成潜能难以充分发挥;此外,如果说外部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转变,几乎与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同步?甚至,从史实角度进行观察,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几乎内化了“对外开放”的一系列举措: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加入WTO等重大开放举措的背后,都是“制度红利”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次,从研究时段上来看,现有文献多选择1978年作为研究起点,重点在于研究“中国奇迹”为什么发生,“中国奇迹”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的经济发展剖析甚少<sup>①</sup>。然而,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所遭遇的困难,我们就难以准确认知中国经济在1978年之后的4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具体而言,如果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全域性的研究梳理,我们就有可能片面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从而无法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实现高速增长的前期制度、要素和外部环境积累。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文献多选取中国经济生产率、人口、产业结构、贸易、创新的某一侧面入手,就制度、比较优势和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进行局部分析,而未能从经济发展质量的视角出发,全方位地梳理中国经济在投入—产出效率、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对外开放与创新要素积累等多维度的长时段变化。然而,只有从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整体性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进行细致剖析,才能更好地解读中国经济这70年历史性变迁的真实密码。

为此,本文选择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作为研究领域,遵循现有文献的通行范式(程虹等,2014、2016;傅元海等,2016;钞小静、任保平,2011),从GDP、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相对增速的高低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时序变化进行整体分析,以厘清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化的主要特征性事实。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二种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出发,就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变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通过长时段历史数据的梳理,我们发现:“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是影响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所引致的配置效应、结构效应、开放效应和学习效应进行梳理,从更细分维度就“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影响长期经济发展质量的具体因素进行剖析。

文章剩余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我们对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的分析方法、动力机制进行实证剖析,并对“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二者叠加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潜在影响效应进行研究;第三节至第五节,分别就“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叠加所引致的配置效应、结构效应、开放效应和学习效应进行剖析,进一步分析“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发展质量的具体路径。最后是结论部分。

## 二、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方法与动力机制

通过文献梳理和历史数据分析,本节对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方法与动力机制进行解析。

<sup>①</sup> 有趣的是,通过查阅有关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若干最新文献(任保平、张倩,2019;李金华,2019),笔者发现: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定量分析,现有文献仍主要侧重于1978年以后;对于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现有研究多为背景性叙述。

(一) 衡量方法

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Zilibotti, 2017; 程虹等, 2014、2016; 傅元海等, 2016; 钞小静、任保平, 2011; Brandt and Zhu, 2010), 我们以 GDP、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相对增速的高低, 作为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方法。首先, 之所以选择 GDP 相对增速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 是因为: 从统计定义上, GDP 可视作一国微观生产单位全部增加值的加总; GDP 增速的快慢, 反映了一国在特定时期内创造增加值能力的高低, 而且这种测算方法既考虑到了存续微观单元经济单元绩效的时序变化情况, 也体现了进入-退出微观单元对宏观经济产出的影响(Brandt et. al, 2012)。并且, 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经济指标, GDP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纳入增长核算体系, 其具有更长的时间序列, 能够尽可能完整地反映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情况。尽管绿色 GDP、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安锦、王建伟, 2015; 王恕立、王许亮, 2017; 李卫兵、梁榜, 2017)能够更好地校正由于未考虑到环境污染、资源保护等因素而对 GDP 测算的潜在干扰, 但由于纳入绿色 GDP、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统计指标涵盖时段较短, 难以反映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变化, 综合考虑研究需要, 本文采用 GDP 相对增速作为反映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次, 我们采用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指标作为衡量投入-产出效率的代理变量, 并以两者相对增速的变化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指标。具体而言, 本文选择人均 GDP 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指标。考虑到数据可比性以及剔除价格波动对统计指标可比性的影响, 并基于跨国分析的需要, 我们根据人均 GDP 的同比增速将其调整为以 2017 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的实际值(美元/人)。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国投入-产出综合效率的重要指标。为对新中国 70 年投入-产出效率进行量化分析, 我们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指标(Y), 以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人口数量)、资本存量分别作为劳动力(L)、资本(K)等要素投入的代理指标, 构造了全球各经济体在上述时期的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 本部分运用生产函数固定效应模型测算的索罗余值(Solow Residual)作为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代理指标, 并以此考察中国经济投入-产出效率的时序变化,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文(1)式:

$$\ln q_{it} = \beta_0 + \beta_k \ln k_{it} + \beta_l \ln l_{it} + \gamma_i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方程(1)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增加值的对数值( $q_{it}$ ), 方程右侧的解释变量则为资本存量( $k_{it}$ )、劳动力数量( $l_{it}$ )的对数值。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重建、朝鲜战争(1950—1953)爆发等外生冲击因素的影响<sup>①</sup>, 我们选择 1952 年作为研究时段的分析起点。考虑到 2018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缺失, 本文为对投入-产出效率进行稳健分析, 故选择 2017 年作为研究时段的下限。由于世界银行跨国数据的期初设置问题,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起点为 1960 年。此外, 为剔除价格波动对统计指标可比性的影响, 各国的 GDP、人均 GDP 与资本存量数据均以 2017 年不变价格美元调整为实际值。遵循实证分析的一般性方法, 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张军, 2004), 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sup>②</sup>按折旧率 9.6% 累计折算为资本存量。

值得说明的是, 单一经济体静态的 GDP、生产率指标无法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情况。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时序分析, 只有从上述指标相对增速的统计之中得到准确评价。为此, 我们采用横向、纵向两个角度进行增速对比, 对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具体而言, 如果某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的 GDP 增速、生产率增速相对于世界其他代表性经济体更快, 或上述指标增速相对于中国前一历史时期也更快, 我们认为: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更高; 反之, 如果某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的 GDP 增速、生产率增速相对于世界其他代表性经济体普遍更慢, 或上述指标增速相对于中国前一

<sup>①</sup>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原则, 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等情况下的经济体不纳入投入-产出效率计算。

<sup>②</sup>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问题, 对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 我们采用世界银行披露的资本形成数据作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代理变量。

历史时期也普遍偏慢,我们则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或存在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 (二) 制度的有效性是“人口红利”的前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等宏观数据,我们分析了“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充分条件。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点:

第一,无论从历史数据还是新中国70年以来人口结构的长期演化趋势来分析,“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充分条件。根据新增长理论的非凸性假设,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的稳态速率与初始要素禀赋存在较强相关性。具体而言,期初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速与储蓄率水平,将会对经济增长的稳态均衡路径产生重要影响(Yao,2014)。根据上述理论猜测,由于不同国家可以运用的初始要素禀赋存在较大差异,这将造成各经济体最终按各自期初要素条件收敛到不同的增长路径。然而,实际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与“人口红利”并不存在完全的线性相关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表1的历史数据表明:在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工业革命初期的1700年之时,全世界人口总数约为6.03亿人,而中国当时人口规模即为1.38亿人,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约为23%;到欧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革命的1820年,全世界人口总数约为10.42亿人,而中国的人口规模增长至3.81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达到历史峰值的37%。随后,截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中国人口仍以较快速率增长至5.47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约为1/5左右。在随后的70年时间内,中国人口规模一直稳定在占全世界1/5的水平(Maddison,2001)。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发现:在全世界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300余年间,“人口红利”一直是中国经济重要的比较优势。尽管更大规模的人口能够带来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更高的创新概率以及更为精密的市场分工(Comin et. al,2010;Lin,1998;Morris,2011),但是,由于缺乏“制度红利”的有效支撑,作为一个拥有至少3个世纪的比较优势,中国“人口红利”的增长潜力迟至1978年才开始得到充分释放。

第二,表2和图1的数据分析表明:从中国人口结构的时序统计角度观察,截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释放。统计发现,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年),尽管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处于从积聚期到释放期的发展阶段,劳动适龄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4873万人增长到1978年的55743万人,人口抚养比自1966年达到历史峰值(81.1%)就开始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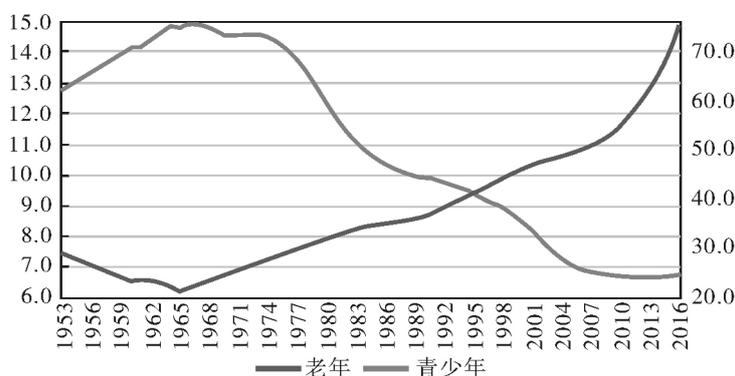


图1 人口抚养比的结构分析(1953—2017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相关指标整理。

下降;但是,中国却并未充分运用“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大起大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具体而言,GDP总量同比增速既有1952—1957年均9.2%、1961—1965年均15.1%的高速增长阶段,也有1960—1961年、1966—1968年的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GDP总量增速既有1958年(18.3%)这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增长的历史峰值,也有1961年(-26.5%)这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下滑的谷底。进一步,将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经济增长划分为1949—1966年、1967—1978年

两个阶段，比较上述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人均 GDP 同比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我们发现：对于 1949—1966 年而言，人均 GDP 同比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 0.065，即对于这一时期而言，在人口总抚养比较高的年份，人均 GDP 增速相对较高，而这是背离人口总抚养比下降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的。对于 1967—1978 年的“人口红利”而言，人均 GDP 同比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高达 -0.347，该相关系数不仅符号上与上述两组数据在 1978—2017 年的相关系数相同，在绝对值上更是大于 1978—2017 年的对应指标。对于这一时期而言，在人口总抚养比较低的年份，人均 GDP 增速相对偏高，这看起来似乎符合“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但细究起来，仍有较多疑问。与 1978—2017 年相比，尤其是与 1996—2017 年相比，人口总抚养比在 1967—1978 年处于 72.7%~80.9% 的较高水平，经济体用于储蓄、资本积累的资源并不丰裕，其远未达到人口总抚养比低于 50% 的“人口红利”黄金率水平。那么，为什么这一时期人均 GDP 同比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却具有更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呢？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各种政治事件对于国民经济的剧烈破坏。这一时期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人均 GDP 增速在 1967、1968 两年分别下滑 8.2%、6.6%。这一时期人口总抚养比逐年下降的特征性事实，造成了人均 GDP 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二者之间的较高负相关水平。数据表明，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人口红利”就在逐渐积聚、释放，但由于制度与发展路线问题，我们未能充分运用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实现经济长期增长。这说明单纯的“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充分条件，“制度红利”是激发“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第三，跨国比较表明，“人口红利”未能有效释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起到了迟滞效应。基于现有文献方法，表 3 比较了 1978 年中国、印度两个发展中大国在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和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上的相关情况。我们发现：与印度相比，截至 1978 年，中国在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存量等“人口红利”因素上更具优势。当时，中国人口总数为 96259 万人，而同期印度人口总数为 66550 万人，中国人口数量较印度高出 44.6%。同期，中国成年人识字率为 65.5%，较印度（40.8%）高出近 25 个百分点；中国预期寿命为 66 岁，较印度（54 岁）高出 12 岁。然而，在“人口红利”更具优势、人力资本存量更高的前提下，中国以 2017 年不变价格美元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却仅为印度的 75.2%。这表明，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制度红利”未能充分形成，制约了“人口红利”作用的有效释放，并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 1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1700—2015 年，单位：亿人）

	1700 年	1820 年	1900 年	1950 年	2001 年	2015 年
中国	1.38	3.81	4	5.47	12.75	13.87
世界	6.03	10.42	15.64	25.21	61.49	71.54
中国占世界比例（%）	23	37	26	22	21	19

注：根据 Maddison(2001)附表整理。

表 2 中国“人口红利”的演进（1952—2017 年）

代表年份	总人口 (单位：万人)	青少年人口占比 (0~14 岁，单位：%)	老年人口占比 (65 岁以上，单位：%)	总抚养比 (单位：%)	青少年抚养比 (单位：%)	老年抚养比 (单位：%)
1952	58,796	36.3	4.4	68.6	61.2	7.4
1956	62,828	37.7	4.1	71.8	64.7	7.1
1961	65,859	39.6	3.7	76.5	69.9	6.6
1966	74,542	41.3	3.5	81.1	74.8	6.3
1971	85,229	40.4	3.8	79.2	72.3	6.9
1976	93,717	39.2	4.2	76.7	69.2	7.5
1981	100,072	34.6	4.9	65.1	57.1	8.0
1986	107,507	30.1	5.4	55.2	46.8	8.4
1991	115,823	28.7	5.7	52.6	43.9	8.7
1996	122,389	26.7	6.3	49.3	39.9	9.4

表 2-续 中国“人口红利”的演进(1952—2017年)

代表年份	总人口 (单位:万人)	青少年人口占比 (0~14岁,单位:%)	老年人口占比 (65岁以上,单位:%)	总抚养比 (单位:%)	青少年抚养比 (单位:%)	老年抚养比 (单位:%)
2001	127,627	23.9	7.1	44.8	34.6	10.2
2006	131,448	19.3	7.8	37.2	26.4	10.8
2011	134,413	17.7	8.6	35.7	24.0	11.7
2016	137,867	17.7	10.1	38.5	24.5	14.0

注: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

表 3 中国与印度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的比较(1978年)

	中国	印度
人均 GDP(2017年不变价格美元)	371	493
成人识字率(%)	65.5	40.8
高等学校入学率(%)	0.7	4.9
预期寿命(岁)	66	54
婴幼儿死亡率(‰)	54.2	106.4
GDP中的制造业份额(%)	40	17
就业人口中的制造业份额(%)	17.3	13

注:引自 Valli and Saccone(2008) and Yao(2014),人均 GDP 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按 2017 年不变价格美元进行了重新计算。

### (三) “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互补性

长时段数据表明,“制度红利”能有效促进“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二者的叠加效应是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动力机制。

第一,“制度红利”的缺乏将对“人口红利”造成阻碍效应。图 2 给出了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sup>①</sup>与人口抚养比的长时段变化情况。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改革开放 40 年两个代表性时段人均 GDP 增长率与人口总抚养比相关系数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1949—1978 年),人均 GDP 增长率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0.054;而到了改革开放 40 年(1978—2017 年),人均 GDP 增长率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0.111,后一阶段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前一阶段高出 1.06 倍。之所以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人口总抚养比下降、“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拉动作用有限,与这一时期“制度红利”相对缺乏有重要关系。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而言,计划经济体制使城镇私营部门基本消失,城镇劳动力基本上全部在国有机关、企事业单位或集体企业就业,“铁饭碗”“大锅饭”的就业体制造成薪酬水平长期固定,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sup>②</sup>(卫兴华,2012)。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长期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助长贫富拉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劳动力、农具、牲畜等生产要素实行无偿调拨的“一平二调”体制,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严重侵犯了集体和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生产率长期低下,人均粮食产量直到 1978 年才超过 1957 年的水平<sup>③</sup>。因此,这一时期“人口红利”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线性关系并不明显。

第二,“制度红利”形成将有效促进“人口红利”释放,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起到重要作用。数据表明,对于改革开放 40 年而言,“制度红利”的充分形成,使得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优化,“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拉动作用得以有效发挥。这一时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展,“村社分开”“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经济获得全面发展,人均农业

① 为进行长时段对比,对于人均 GDP 增长率,我们按 2017 年不变价格美元人均 GDP 进行计算。

② 举例而言,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的 10 年时间,城镇职工工资一直被冻结,只是在 1971 年底对总数 30%的职工提高过一次工资,主要还是出于粉碎林彪集团后的政治需要。直到 1977 年 8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后,我国 60%的城镇职工工资才获得一定程度提高;直到 1978 年 2~5 月,城镇部门才开始建立加班工资、奖金、计件工资等激励劳动积极性的工资制度。引自曾壁钧、林木西:《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 年,第 296-297 页。

③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00 页。

总产值 1978—1984 年均增速 7.6%，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峰值，显著高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 2.7% 的年均增速。与此同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通过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下，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较大发挥，城镇部门的生产效率开始稳步提高。从 1978—1992 年，人均 GDP 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的 -0.054 转变为 -0.068，“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1992 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后，通过国有企业改革等举措，民营市场主体的发展空间充分释放，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人口红利”获得进一步释放。1992—2007 年间，人均 GDP 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达到 -0.161，“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历史峰值。

第三，“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将有效延长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通过对人均 GDP 增长率与人口总抚养比相关系数的长时段梳理，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在 2007 年之后趋于下降。一方面，人口总抚养比自 2007 年达到 36.4% 的历史低点后就逐年上升，直至 2018 年前后接近 40% 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新增劳动适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劳动适龄人口自 2016 年达到 99605 万人的历史峰值后也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有趣的是，尽管“人口红利”从峰值向后期转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并未随之放缓。统计表明，2007—2017 年间，人均 GDP 增长率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 -0.553，其绝对值较 1992—2007 年扩大了 2.4 倍。在“人口红利”趋于下降的情况下，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扩大，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尤其是 2012 年党的十八大、2017 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国家相继出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战略，中国经济的营商环境改革进一步加快，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增强，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因此，尽管“人口红利”在总量上趋于下降，但由于“制度红利”的叠加效应，中国“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得以有效延长，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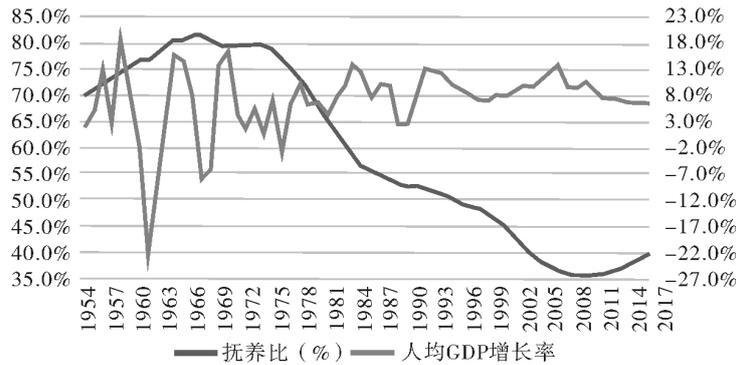


图 2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1954—2017 年)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指标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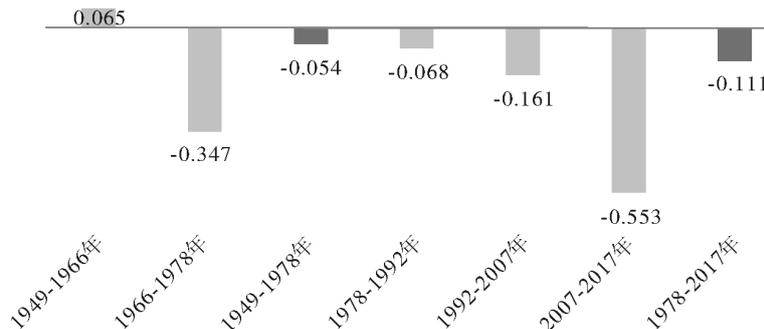


图 3 不同时段人均 GDP 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相关系数的统计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指标整理。

总体而言,基于跨国比较和时序分析,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充分条件;只有“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才是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机制。通过对“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演进趋势的经济史梳理,我们认为:“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将有效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变迁,推动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改善与技术模仿和创新能力的增强。因此,“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将从配置效应、结构效应、开放效应与学习效应四个维度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产生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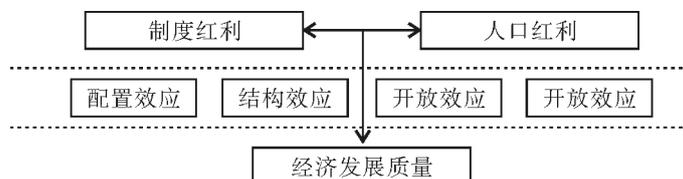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

### 三、配置效率与生产函数的阶段演变

“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叠加效应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基于新古典分析方法,本部分构造了新中国70年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并通过跨国比较、时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70年间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演化情况。结果发现,通过“制度红利”对“人口红利”比较优势的不断释放,新中国70年投入-产出效率经历了从“低位震荡”到“高速增长”的历史转变;资源配置效率随着“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有机叠加而不断提升。

#### (一) 投入-产出效率从低位震荡到高速增长

表4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生产函数相关指标的时序变化情况。从中,我们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发现: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阶段与“一五”计划时期(1952—1957年),中国经济呈现出“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以2017年不变价格美元测算的GDP总量从1952年的753亿美元增长至1957年的1171亿美元,年均增速为9.2%,较1949—1978年世界GDP平均增速(4.8%)高出近1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资本存量则从1952年的97亿美元增长至1957年的604亿美元,年均增速44.2%。投入-产出效率方面,这一时期以人均GDP为代理指标的劳动生产率,则从1952年的132美元增长至1957年的184美元,年均增速6.9%。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速度快,而且效益好,主要与“一五”计划期间所执行的“重点突出、兼顾平衡”的宏观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发展薄弱、生产资料积累偏低的局面,“一五”计划制定的轻重工业投资比例为1:7.3,高于苏联的前三个五年计划。基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起步迅猛,与1952年相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年均增速达18%,超过计划规定值(14.7%)3.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生产资料生产1957年比1952年增长2.1倍,年均增长25.4%,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6%提高到1957年的48.3%。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负责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意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抓好重点项目,但突出重点并非孤立地只发展重点。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国民经济的各方面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要充分注重综合平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sup>①</sup>”。因此,在上述指导方针下,“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比较协调:重、轻、农总产值年均增速分别为25.4%、12.9%和4.5%。轻工业、农业的相应发展基本保证了人民生活消费的需要,并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原料、资金、劳动力。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08页。

第二，“大跃进”期间与三年困难时期(1958—1961年)，错误的发展战略造成“制度红利”缺乏，中国经济呈现出“高投资、低增长”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GDP 总量不升反降，从 1957 年的 1171 亿美元下滑为 1961 年的 1121 亿美元，GDP 增速也呈现出“大起大落、震荡下行”的不利趋势，1958—1961 年的 GDP 同比增速分别为 21.3%、8.8%、-0.3% 和 -27.3%。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资本存量则从期初的 604 亿美元攀升至 1961 年的 1665 亿美元，年均增速 28.9%。除 1961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积极回调(-67.5%)外，在经济增长整体停滞的前提下，1958—1960 年的资本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 83.0%、30.3% 和 10.6%，“高投资、低增长”所带来的投入-产出效率恶化趋势较为明显。劳动生产率方面，这一时期人均 GDP 从 1957 年的 184 美元下降到 1961 年的 170 美元；相对世界前沿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 指数)<sup>①</sup>，中国从 1960 年的 5.5 下降为 1961 年的 0，这表明：在“大跃进”期间与三年困难时期(1958—1961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投入-产出效率不仅没有实现大跃进“赶英超美”的宏伟目标，反而相对世界前沿水平有所恶化。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重大挫折，与错误的发展战略造成“制度红利”缺乏有很大关系。在过于乐观情绪的主导下，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冒进口号，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结构跃升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下降。在上述赶超型发展战略的作用下，以钢铁为代表的重工业被片面强调，“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忽视；加之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炼钢铁”等群众性运动的开展，经济建设客观规律被打破，最终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国民经济的大倒退(武力，1999；汪海波、董志凯，1995)。

第三，国民经济调整与恢复时期(1962—1965年)，“制度红利”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人口红利”作用，中国经济呈现出“低投资、高增长”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GDP 总量稳步增长，从 1961 年的 1121 亿美元增长到 1965 年的 1613 亿美元，年均增速 15.1%，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的最高增长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资本存量则从 1961 年的 1665 亿美元增长至 1965 年的 1872 亿美元，年均增速为 3%。这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通过生产关系调整激发劳动者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投入-产出效率方面，这一时期以人均 GDP 为代理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从 1961 年的 170 美元增长至 1965 年的 226 美元，年均增速 7.4%；TFP 指数则从 1961 年的 0 恢复到 1965 年的 4.6，生产效率优化也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的最好水平。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之所以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趋势，与发展战略的适时调整、“制度红利”的恢复有较大关系。1961 年，面对“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党和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同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从 1961 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sup>②</sup>。围绕上述发展战略，国家逐步出台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工业生产计划指标、改善工业生产内部结构、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大力发展农业等积极举措，前期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调整。此外，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方针下，国家相继开展农村试行“包产到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措施，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个角度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四，“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66—1978年)，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制度红利”缺位，致使“人口红利”无法释放，中国经济发展始终徘徊于“低位震荡”。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 3 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滑坡。由于一大批具有丰富经济管理工作经验的领导人被打倒，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国民经济陷入全面灾难。这一时期，GDP 总量从 1966 年的 1785 亿美元下降到 1968 年的 1613 亿美元，1967、1968 两年分别下降 8.2% 和 6.6%。与此同时，资本存量从 1966 年的 2019 亿美元增长为 1968 年的 2130 亿美元，年均增速仅为 2.7%。投入-产出效率方面，人均 GDP 从 1966 年的 243 美元下降到 1968 年的 208 美元，年均降幅 7.4%；TFP 指数从 1966 年的 4.6 下降到 1968 年的 3.4，中国经济

① 所谓 TFP 指数，本文测算的是中国 TFP 相对于相同年份世界前沿技术水平 TFP 的百分比(0~100)。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月报》，1961 年第 2 期，第 1-2 页。

与世界前沿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国家政治局势稍趋稳定,经济开始缓慢复苏。然而,由于1974年“批林批孔”、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等诸多政治运动的干扰,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呈现剧烈震荡,GDP同比增速既有1969、1970两年分别13.8%、16.1%的高速增长,也有1971—1974年间年均增速4.6%的低速徘徊,更有1976年—3.1%的下降。这一时期,人均GDP仅从1969年的237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371美元,年均增长5.1%;TFP指数仅从1969年4.7增长到1978年的6.0,年均增速仅为2.7%。截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严重: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1978年的人均居住面积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仅略高于1957年;轻重比例失调严重,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57%,消费品与购买力的差额高达100多亿元;经营管理混乱,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中,有13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38项消耗指标中有21项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sup>①</sup>。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中高速增长的发展区间,“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叠加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首先,随着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1983年人民公社的废除,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自主权逐渐扩大,通过推行经济责任制、推行利改税、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实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举措,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得到坚持,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较大程度调动。GDP总量从1979年的3814亿美元增长到1991年的10920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0.1%;人均GDP则从期初的394美元增长至1991年的949美元,年均增速为8.3%。与此同时,TFP指数从1979年的6.1提高到1991年的12.6,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相对于世界前沿水平的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其次,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以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民营企业获得了长足发展。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加快推进<sup>②</sup>,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1992—2000年,GDP总量从12472亿美元增长到26943亿美元,年均增速10.1%;人均GDP则从1071美元增长到2134美元,年均增速为9.0%;TFP指数从13.4增长到19.3,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首次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20%。再次,2001年加入WTO之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获得较大程度改善,在全球化竞争中,中国经济规模、投入—产出效率均有较快发展。2001—2010年,GDP总量从2001年的29190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73475亿美元,年均增速10.8%,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增速水平;人均GDP则从2295美元增长到5493美元,中国完成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式发展;TFP指数则从19.8提高到25.8,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已达到世界前沿水平的1/4。分析表明:技术学习效应、竞争效应都是中国经济加入WTO前后生产率增速出现提高的重要原因(Khandelwal, Schott and Wei, 2013; 简泽等, 2014; Brandt et. al, 2017a)。最后,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GDP同比增速从2011年的9.5%逐渐下降到2015—2017年间的6.8%,并稳定在6.7%~6.9%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与此同时,由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于资源错配的校正作用,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进入21世纪以来均保持相对平稳(文东伟, 2019; 王家庭等, 2019)。随着2012年党的十八大、2017年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国家相继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战略,中国经济结构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得到有效调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创新动能获得充分激发。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TFP指数已从2011年的26.5增长到2017年的30.6,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已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近1/3。

综上,通过对中国经济生产函数主要指标的梳理,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遵循了一个前30年“低位震荡”、后40年“高速增长”的发展趋势,“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对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0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

表 4 中国的生产函数(1952—2017 年)

代表年份	GDP (2017 年美元) (单位:亿美元)	人均 GDP(2017 年美元) (单位:美元/人)	劳动适龄人口 (15~64 岁) (单位:万人)	资本存量 (2017 年美元) (单位:亿美元)	TFP 指数 (前沿=100)
1952	753	132	34,873	97	
1956	1,114	180	36,572	461	
1961	1,121	170	37,308	1,665	0
1966	1,785	243	41,162	2,019	4.6
1971	2,409	286	47,569	2,795	4.9
1976	2,951	317	53,037	4,295	5.0
1981	4,324	435	60,622	6,516	6.9
1986	7,429	696	69,280	12,394	9.8
1991	10,920	949	75,902	21,449	12.6
1996	19,582	1,608	81,948	40,925	16.7
2001	29,190	2,295	88,146	69,300	19.8
2006	48,463	3,697	95,827	133,867	22.9
2011	80,481	5,988	99,070	291,448	26.5
2016	114,478	8,304	99,507	583,190	29.9

注:1. GDP 总量、人均 GDP 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并调整为 2017 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2. 劳动适龄人口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3. 资本存量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整理,按折旧率 5%运用永续盘存法调整为资本存量,并调整为 2017 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

(二) 生产率位次从低水平均衡迈向增长奇迹

图 5~7 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相对位次的变化情况。从中,我们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发现:

首先,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从 1978 年以后快速上升。图 5 给出了中国与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 GDP 占世界比重的相对变化情况。我们发现,一方面,作为占世界人口 1/5 的发展中大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 30 年,中国占世界 GDP 的比例长期在 1.1% 的低位徘徊;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调,加之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左”倾错误路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甚至在 1961—1969 年之间长期低于 1%,最低时仅为世界的 0.7%。这表明,由于错误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巨大的劳动力优势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与此同时,与同期美国经济总量相比,中国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 4.3% 左右,考虑到人口规模因素,中国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 1% 左右<sup>①</sup>。这一时期,作为东亚经济体的又一重要代表,日本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从 7% 增长至 10.6%,中国滞后于东亚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起飞大约 30 年左右。另一方面,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任务,加之农业部门、城市部门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制度红利”充分释放了沉睡的“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开始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1978—2000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例从 1.1% 增长到 4.5%,中国经济规模从仅为美国的 4.3% 提高到 17.6%,劳动生产率从相对于美国的 1% 提高到 4.1%。2001 年以后,依托加入 WTO 的对外开放优势,中国人口规模优势进一步释放,“增长奇迹”开始为世人瞩目。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 GDP 比重于 2007 年突破 7%,接近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经济起飞期间所达到的相对规模;2009 年经济规模占世界比例突破 8.7%,超过同期日本的 8.6%,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日益凸显。截至 2017 年,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 12.7%,相对于美国 GDP 总量的 58.6%,上述指标均突破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 1991 年所达到的峰值水平。在劳动生产率上,中国从 2000 年相对于美国的 4.1% 提高到 13.8%,中国资源配置效率与世界前沿的差距正在加快缩小。

其次,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所造成的“制度红利”缺位,致使中国经济错失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sup>①</sup> 按 1960—2017 年,中美两国人口规模 4.25:1 的平均值进行推算。

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图6给出了1978年以前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sup>①</sup>、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人均GDP名义值上的对比情况。我们发现,在相似期初发展水平的前提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GDP差距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例如,中国与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具有极为相似的期初发展水平<sup>②</sup>,但从1973年开始,中国人均GDP即开始显著低于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sup>③</sup>;截至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73.5%<sup>④</sup>。在具有相同人口规模优势、文化背景乃至制度基础的前提下<sup>⑤</sup>,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与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出现“大分流”?其中原因耐人深思。又如,在具有相似前期发展条件的前提下,同样作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一员,韩国的人均GDP就从1960年的15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的34.9%)增长到1978年的139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的69.9%),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相似的期初条件与外部环境,为什么中国未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前30年实现经济起飞?总体而言,这与当时我国采取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所造成的“制度红利”缺位有较大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强始终抱着迫切和“只争朝夕”的心情,在这种“左”倾情绪冒进的左右下,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执行了一条片面发展重化工业、通过人民公社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工业化投资高速积累的发展战略。由于上述战略选择忽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以及资本积累上的相对劣势,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与投入-产出效率的下滑。说到底,中国经济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错失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造成市场主体激励-约束错位,从而造成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人口红利”无法充分释放有密切关系的。加之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进一步造成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长期未能得到有效纠正。这就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严重局面,甚至人均GDP从1960年相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69%下降到1978年的32%,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甚至较我们当时倾力援助的非洲国家还要低。面对中国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所遭遇的挫折,邓小平有过一个精辟总结:“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sup>⑥</sup>”。

第三,改革开放战略选择促进“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有机叠加,成就了新中国成立以后40年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图7给出了1978—2017年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人均GDP名义值上的对比情况。我们发现,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1992年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主体市场的积极性得到显著增强,劳动力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人口大国的存量优势开始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优势。1978—2000年,中国人均GDP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快速收敛,199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现价美元,高于同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604现价美元,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开始整体超过非洲;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59现价美元,高于同期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956现价美元的水平,中国经济开始在东亚发展中经济体中逐渐趋于领先地位。2001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外部市场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能进一步释放,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加速提高。中国人均GDP于2001年突破1000现价美元,超过中下等收入国家标准(996现价美元);于2010年达到4009现价美元,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3896~12055美元)。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827现价美元,已逼近拉美地区

①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规则,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剔除了高收入国家,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加总。

② 例如,1960年中国人均GDP为89.5现价美元,同期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为89.8现价美元,两者仅相差0.3现价美元。

③ 同年,中国人均GDP为157现价美元,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为162美元,中国为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97%。

④ 同年,中国人均GDP为156美元,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为213美元。

⑤ 例如,中国与同为东亚经济体的越南、朝鲜、老挝、蒙古均具有相同的社会主义制度。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5、228-329页。

9109 美元的标准;2018 年中国人均 GDP 更是达到 9633 美元,首次超过拉美地区。基于 2013—2018 年名义人均 GDP 的年均增速(6.4%),中国人均 GDP 预计将于 2022 年达到 12327 现价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2056 美元及以上)。

综上,通过对中国经济相对位次的长时段梳理,我们发现:由于“制度红利”缺位对“人口红利”的阻滞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中国经济始终停滞于“低水平均衡陷阱”;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得到不断优化,“人口红利”的增长潜力真正转化为现实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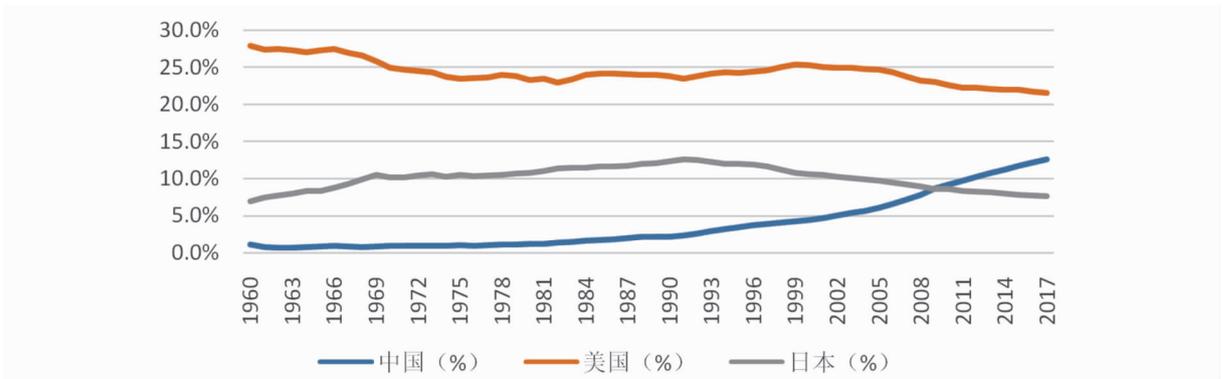


图 5 中国、美国、日本 GDP 占世界比例的时序统计 (1960—2017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GDP 根据价格指数调整为 2010 年不变价格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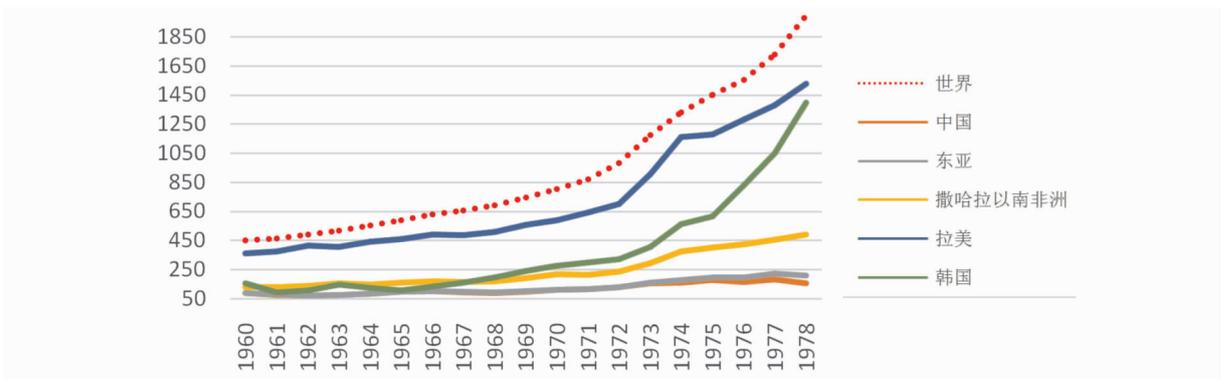


图 6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均 GDP 对比 (1960—1978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人均 GDP 以现价美元进行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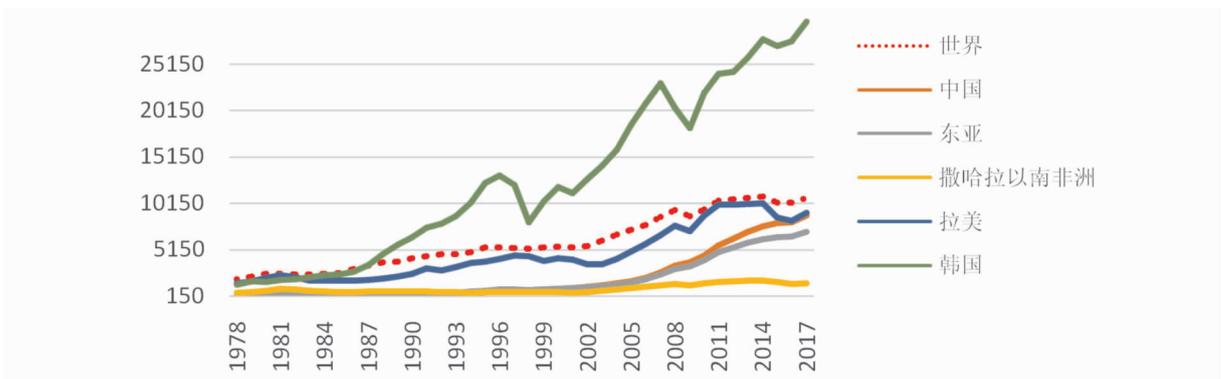


图 7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均 GDP 对比 (1978—2017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人均 GDP 以现价美元进行计算。

## 四、结构变迁与平衡增长

前文分析,结构效应是“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重要影响。而经济结构的不断改善,将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本部分通过多种来源统计数据,分析了新中国70年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与市场化等重要维度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我们发现,通过“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有机叠加,新中国70年的经济结构变迁逐渐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结构逐渐从“不平衡增长”走向“平衡增长”。

### (一) 产业结构从不平衡转向再平衡

表5和图8分别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间中国经济三大产业GDP占比、就业人员占比以及相对效率占比的变化情况。从中,我们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发现:

第一,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而言,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结构跃升造成了明显的结构失衡问题。一方面,尽管中国自“一五”计划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第二产业占GDP比例从1952年的20.9%快速上升至1978年的47.9%,但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仅从1952年的7.4%增长到1978年的17.3%;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在1978年仍占GDP的28.2%,就业人员占比更是高达70.5%。上述数据表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并未驱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相对高效率的第二产业部门转移,劳动力结构转型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第三产业发展基本停滞,具体表现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从1952年的28.2%下降至1978年的23.9%,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也仅从1952年的9.1%小幅增长到1978年的12.2%。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是较为片面的,工业化仅实现了第二产业单部门的快速发展,并未有效驱动第一、三产业的协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结构跃升下,“制度红利”缺位造成工业化发展背离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在第二产业的GDP占比提高27个百分点的同时,就业人员占比仅提高了9.9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一时期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大规模投资,而非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从第一、三产业相对效率的变化情况来看,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产业结构的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sup>①</sup>作为基准(100),第一产业的相对效率指数从1952年的21.6下降到1978年的14.4,而第三产业的相对效率指数也从1952年的109.8下降到1978年的70.8。

表5 中国经济的结构变迁(产业结构,1952—2017年)

代表年份	第一产业 GDP占比(%)	第二产业 GDP占比(%)	第三产业 GDP占比(%)	第一产业就业 人员占比(%)	第二产业就业 人员占比(%)	第三产业就业 人员占比(%)
1952	51	20.9	28.2	83.5	7.4	9.1
1956	43.5	27.3	29.2	80.6	10.7	8.7
1961	36.5	31.9	31.7	77.2	11.2	11.7
1966	37.8	37.9	24.3	81.5	8.7	9.8
1971	34.2	42	23.8	79.7	11.2	9.1
1976	32.9	45.2	21.9	75.8	14.4	9.7
1981	31.9	46.1	22	68.1	18.3	13.6
1986	27.1	43.7	29.1	60.9	21.9	17.2
1991	24.5	41.8	33.7	59.7	21.4	18.9
1996	19.7	47.5	32.8	50.5	23.5	26.0
2001	14.4	45.2	40.5	50.0	22.3	27.7
2006	11.3	48.7	40	42.6	25.2	32.2
2011	9.4	46.4	44.2	34.8	29.5	35.7
2016	8.6	39.9	51.6	27.7	28.8	43.5

注: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sup>①</sup> 在国民收入账户的宏观经济分析中,为便于跨产业部门比较,我们采用人均增加值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变量。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与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有关。上述发展战略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初期产业结构偏重于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用于生产资料积累的重化工业发展不充分，造成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的情况。应该说，上述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但是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战略，就会造成经济发展偏离中国“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举例来说，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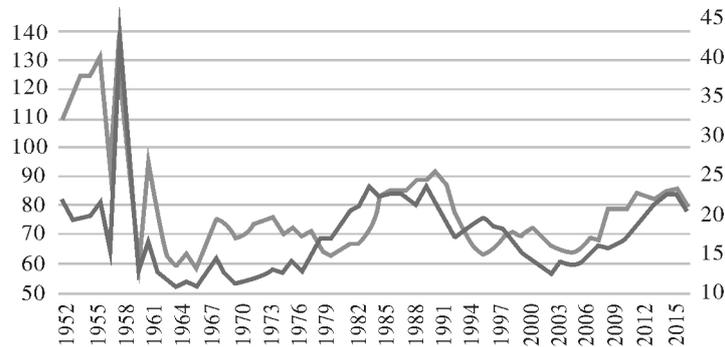


图 8 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相对效率的时序变化 (1952—2017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整理。第一、第三产业的相对效率，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取 100 为基准计算。

所占比重，“一五”时期只占 36.1%，而“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达到 51.1%和 49.6%。截至 1978 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比仅为 30.7%，而重工业占比接近 70%，这就造成工业发展无法满足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当时，由于轻工业落后，轻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市场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的差额高达 100 多亿元<sup>①</sup>。不仅如此，由于过于强调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我国实际上将大量可用生产要素投入到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这就造成投资效率不高，经济绩效很差的局面。仅以 1978 年为例，当年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达 24.3%，亏损额高达 37.5 亿元，流通领域中货物紧缺与积压并存，全国商品库存中，质次价高、冷背呆滞、残损变质的商品总值达 100 多亿元<sup>②</sup>。

第二，改革开放前 30 年，随着“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呈现“工业优先、兼顾平衡”的发展特点。一方面，1978—1984 年，产业结构在农业恢复性发展、轻工业快速增长趋势下，实现了较为平衡的增长。这一时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农业生产效率出现较大幅度提高。1978—1984 年，粮、棉、油的亩产量年均增速分别为 4.1%、10.8%和 5.9%，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农业总产值年均 2.7%的增长速度。农业的恢复性发展，为轻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基础原料。1978—1984 年间，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1.7%，高于同期重工业总产值年均 6.6%的增长速度，也高于 1953—1984 年轻工业总产值年均 9.6%的增长速度。轻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增长最快的是纺织工业、传统“老三件”和家用电器。1984 年与 1978 年相比，呢绒、化学纤维和丝织品分别增长 1 倍、1.6 倍和 93%；自行车、手表分别增长 2.4 倍、1.8 倍；洗衣机、电风扇、收音机、电视机和电冰箱分别增长 14451.5 倍、11.9 倍、0.9 倍、18.4 倍和 33.2 倍。在上述背景下，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从 1978 年的 47.9%小幅下降到 1984 年的 43.1%，而就业人员占比则从 1978 年的 17.3%提高到 1984 年的 19.9%。这表明，我国开始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工业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吸收能力逐渐增强，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在相对效率方面，第一产业相对效率从 1978 年的 14.4 提高到 23.2，达到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最好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

① 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89 页。

②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年，第 637-638 页。

义原则得到坚持,市场主导型的产业结构变迁致使经济发展质量提升。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城市部门的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1984—2000年,我国第二、三产业占GDP比例分别从1984年的43.1%、24.8%增长至2000年的45.9%和39%,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则分别从1984年的19.9%、16.1%提高到2000年的22.5%和27.5%。这表明,在“制度红利”的催化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城市部门对于“人口红利”的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我国在保证工业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前提下,充分重视第三产业发展。自1994年起,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就逐渐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成为我国吸纳劳动力的最大部门。此外,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充分的市场竞争在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第三产业发展。2000—2008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45.9%提高到2008年的48.6%,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历史峰值。这表明,我国经济已整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从2000年的22.5%、27.5%提高到2008年的27.2%和33.2%;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则从2000年的50%下降到2008年的39.6%,这表明: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加快转移,城市已成为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最重要雇佣部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性的问题,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显著的“工业优先”特点。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基准(100),第一、三产业相对效率在1978年分别为14.4和70.8;到2008年,第一、三产业相对效率分别为16和67.6。这表明,第二产业效率的快速增长是改革开放前30年人均GDP增长、TFP提升的重要原因。

第三,改革走向纵深促进“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更为紧密,产业结构更为平衡。2008年以来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以及工业4.0、信息化与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再平衡”趋势开始加快。一方面,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例从2008年的11.3%、48.6%和40.1%调整为2017年的7.9%、40.5%和51.6%;从2013年起第三产业占GDP比例逐渐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工业优先、服务业相对滞后”的不平衡局面得到扭转。另一方面,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2008年的39.6%、27.2%和33.2%变化为2017年的27%、28.1%和44.9%;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已逼近50%,成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部门。此外,三大产业的相对效率变化也表明,产业结构呈现出“再平衡”的重要变化。第三产业相对效率从2008年的67.6上升到2017年的79.7,表明二、三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在快速收敛;而第一产业的相对效率也从2008年的16提高到2017年的20.3。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仍然较大,这表明:如果达到与第二产业相同的生产效率水平,按2017年劳动适龄人口规模(99379万人)计算,我国仍有21385万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向二、三产业转移。如果完成上述转移任务,我国最终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GDP的比例将从2017年的27%下降到5.5%。

## (二) 城市化与市场化驱动的结构变迁

表6和表7分别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城市化与市场化两个层面的演进情况。从中,我们发现:随着“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在产业结构从“不平衡”走向“再平衡”的同时,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的相对滞缓走向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提升。上述两个侧面的结构变化,也是“制度红利”促进“人口红利”充分释放、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缩影。

第一,随着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经济的城市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的发展滞缓转向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提升。一方面,受到计划经济模式、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约,“制度红利”的欠缺造成中国城市部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未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走上了一条投资偏向性的发展道路。这就造成了城市部门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十分有限。与此同时,由于农业、农村长期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生产要素的“一平二调”体制使农户生产积极性无法有效提高,造成农业生产率长期低下,也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动。加之20世纪50年代中期城

乡户籍二元体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限制，致使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在低位徘徊。城镇就业人口占比仅从 1952 年的 12% 增长到 1978 年的 23.7%，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仅从 1952 年的 12.5% 提高到 1978 年的 17.9%，4/5 左右的劳动力资源仍集中于农村地区。这极大制约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产生了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 30 年，城乡之间的一系列制度变革驱动了“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有机匹配，促进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农村承包制度改革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温饱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得到基本解决，这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城市经济综合体制改革、轻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遵循了中国的“人口红利”与比较优势，使得城市部门的市场主体活力得到了增强。加之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1 年中国加入 WTO，更为全面深入的改革开放使市场竞争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积极性不断释放，“制度红利”有效驱动了“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占比从 1978 年的 23.7% 增长到 2008 年的 39%，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则从 1978 年的 17.9% 提高到 2008 年的 47%。此外，随着 2008 年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以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得到进一步深入。这一时期城镇就业人口占比从 2008 年的 39% 扩张到 2017 年的 54.7%，而城镇人口占比则从 2008 年的 47% 提高到 2017 年的 58.5%。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4 年以来，以城镇就业人口占比、城镇人口占比等两个主要指标衡量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跨越了 50% 的门槛值，这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已整体达到中等水平，基本实现改革开放初期所设定的相关发展目标（周一星，1988），正在朝城市化后期阶段（人口城镇化率 70%~90%）演化。

第二，随着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的“一大二公”转向改革开放 40 年的跨越式发展。自 1956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私营工商业全部改造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市场主体全部内化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部门，缺乏经营自主权。从数据统计上，我国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在 1956—1983 年之间始终保持为 100%。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镇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推进，尤其是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制度红利”为市场主体培育带来了久违的春天。1983—1995 年，我国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从 1983 年的 0% 提高到 1995 年的 5.8%；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确立“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目标等诸多举措的开展，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多种所有制发展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1995—2000 年，我国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从 1995 年的 5.8% 提高到 2000 年的 17.3%。2001 年加入 WTO 后，更为开放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使我国非公市场主体的数量、规模都迎来了跨越式发展。2001—2008 年，非国有部门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从 2000 年的 17.3% 提高到 2008 年的 41.7%；到 2012 年，我国非国有部门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首次超过国有部门，达 51.2%；截至 2017 年，非国有部门已雇佣超过 63.3% 的城镇就业人员，“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有机叠加，使得民营经济部门最终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市场主体。

表 6 中国经济的结构变迁(城市化发展,1952—2017 年)

代表年份	城镇就业人口占比(%)	农村就业人口占比(%)	城镇人口占比(%)	农村人口占比(%)
1952	12.0	88.0	12.5	87.5
1956	13.0	87.0	14.6	85.4
1961	20.9	79.1	19.3	80.7
1966	18.0	82.0	17.9	82.1
1971	19.3	80.7	17.3	82.7
1976	22.4	77.6	17.4	82.6

表 6-续 中国经济的结构变迁(城市化发展,1952—2017年)

代表年份	城镇就业人口占比(%)	农村就业人口占比(%)	城镇人口占比(%)	农村人口占比(%)
1981	25.3	74.7	20.2	79.8
1986	25.9	74.1	24.5	75.5
1991	26.7	73.3	26.9	73.1
1996	28.9	71.1	30.5	69.5
2001	32.8	67.2	37.7	62.3
2006	37.1	62.9	44.3	55.7
2011	47.0	53.0	51.3	48.7
2016	53.4	46.6	57.4	42.7

注: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表 7 中国经济的结构变迁(市场经济发展,1978—2017年)

代表年份	国有单位占城镇 就业人员比例(%)	非国有单位占城镇 就业人员比例(%)	国有单位占全部 就业人员比例(%)	非国有单位占全部 就业人员比例(%)
1978	100	0	23.6	76.4
1982	100	0	24.9	75.1
1987	99.5	0.5	24.9	75.1
1992	98.1	1.9	21.9	78.1
1997	92.6	7.4	19.9	80.1
2002	75.4	24.6	11.2	88.8
2007	59.4	40.6	9.3	90.7
2012	48.8	51.2	9.7	90.3
2017	36.7	63.3	8.3	91.7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是指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集体企业就业人员的总和。

## 五、经济发展从开放效应到学习效应

“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之所以能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开放效应、学习效应是两个重要的影响渠道。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可以视作发展中经济体向前沿技术水平追赶与收敛的一个过程。因此,“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可以提高中国经济对前沿技术国家的吸引力,从而为获取外生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吸收和技术扩散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将对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结构优化创造有利条件(Xing and Detert, 2010; Lau et. al, 2007; Brandt et. al, 2012; Khandelwal, Schott and Wei, 2013)。现有文献认为:贸易自由化、FDI是影响经济增长、TFP提升的两个重要的外部渠道。这是因为,一方面,进出口贸易、FDI能够推动中国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通过市场竞争形成技术扩散的正外溢效应(黄菁等, 2008; 毛其淋、盛斌, 2012; 傅元海等, 2014; 葛顺奇、罗伟, 2015);另一方面,对外开放能够加快高效率企业进入,低效率企业退出,使中国经济整体TFP提升(Brandt et. al, 2012; Brandt et. al, 2017)。因此,“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所创造的开放效应,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新增长理论认为:随着发展中经济体与世界前沿技术水平的不断收敛,经济追赶造成外生技术吸收的边际成本逐渐提高,而技术吸收的边际收益则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随着经济追赶的推进,内生技术创新的边际成本趋于下降,而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逐渐提高。因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最优的追赶策略应该从技术模仿转向技术创新(Benhabib et. al, 2014)。考虑到中国人均GDP已迈进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且“人口红利”已整体进入中后期(Li et. al, 2012),中国应该进一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投入加快知识生产,通过学习效应使“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得到延长。

### (一) “隐士中国”转向“全球化中国”

表 8、图 9~11 分别给出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经济在对外贸易、FDI 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本文将中国与东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等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关指标进行了跨国比较。从中，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表 8 中国经济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1952—2017 年)

代表年份	货物进出口总额	货物出口	货物进口	服务进出口总额	服务出口	服务进口	净出口
1952	53	22	31				-8
1956	86	44	42				2
1961	66	33	32				1
1966	107	55	52				3
1971	117	64	53				11
1976	257	131	126				5
1981	972	486	486				0
1986	1824	764	1060	151	96	57	-256
1991	3865	2046	1817	390	271	117	383
1996	6572	3424	3147	1147	635	512	399
2001	11107	5799	5308	1709	854	856	489
2006	30999	17062	13937	3589	1814	1775	3164
2011	38706	20176	18530	4771	2136	2634	1149
2016	37701	21458	16244	6768	2143	4625	2732

注：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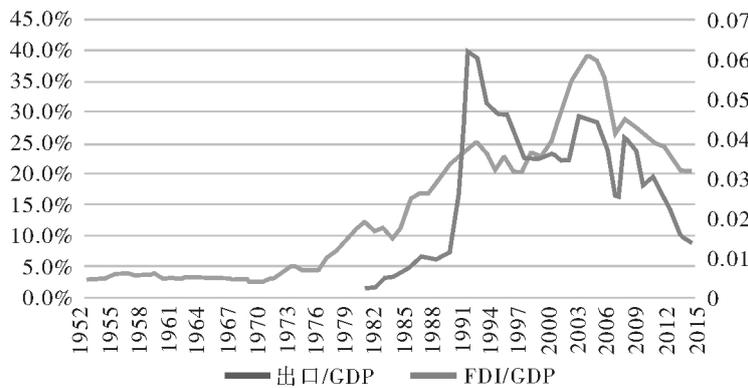


图 9 出口与 FDI 净流入占 GDP 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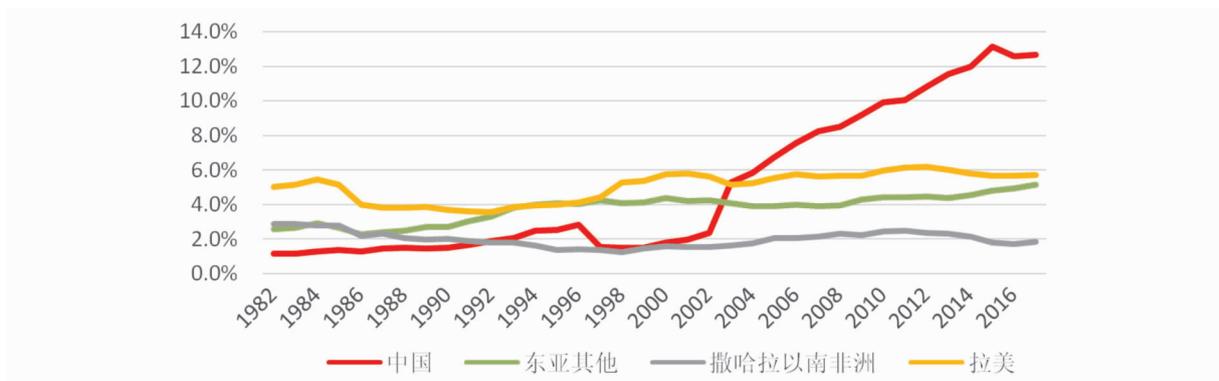


图 10 出口与 FDI 净流入占 GDP 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整理。东亚为不包括中国和高收入国家的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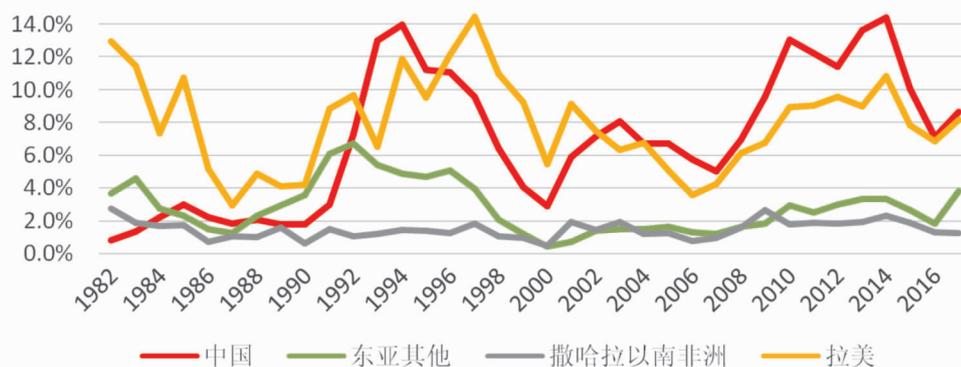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 FDI 净流入占全世界比例的时序统计(1982—2017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一边倒”的制度选择使中国经济的外部发展环境较为孤立。从数据上看,1952—1970 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从 1952 年的 53 亿美元<sup>①</sup>增长到 1970 年的 112 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4.2%)较同期 GDP 增速(6.3%)低 2.1 个百分点。这一时期,进出口占 GDP 的比例从 1952 年的 7%下降到 1970 年的 4.9%,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升反降。之所以造成外部发展环境较为孤立的情况,与当时中国“一边倒”的制度选择有较大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意识形态、朝鲜战争等因素的制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了施加压力以增加其困难的态度。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政府只能全力获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采取“一边倒”具有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进出口市场受到了较大制约,因此造成对外开放程度逐渐下降。不仅如此,由于中苏两国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上的理解差异,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全面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对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造成了进一步挤压<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出口市场极难拓展,而且获得外部先进技术的可能性也十分有限。外部环境的孤立,使得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主要采取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第二,1970—1978 年,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开放,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外生技术引进与资源配置优化(代谦、李唐,2009; Brandt, Ma and Rawski, 2014)。从数据上看,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从 1970 年的 112 亿美元增长到 1978 年的 489 亿美元,进出口年均增速(20.3%)较同期 GDP 增速(5.8%)高出 14.5 个百分点。这一时期,进出口占 GDP 比例从 1970 年的 4.9%增长到 1978 年的 13.8%,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的历史峰值。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与外部环境得到改善有关。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发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一时期,中国在以“四三方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大规模技术引进方案的指导下,开始向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瑞典、荷兰、美国等国家引进所缺乏的关键性技术,主要涵盖化肥、化纤、石油化工产品大型成套生产设备、综合采煤设备、电站设备和一米七轧机等机器设备<sup>③</sup>。在这次对外技术交流活动中,“四三方案”的制订及其贯彻执行,再次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技术交流的大门。“四三方案”主要引进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化肥、石油化工、冶金工业的发展,为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是在出口增长有限情况下,进口尤其是技术装备进口急剧扩大所导致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由此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国际贸易逆差。以 2017 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国际贸易逆差从 1970 年的 2

① 为便于跨国比较,进出口贸易总额我们按 2017 年不变价格美元进行了调整。

②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58—1965)》,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年,第 127—128 页。

③ 这些技术引进方案包括 1972 年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以及 1973 年《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总进口金额约 43 亿美元,因此简称为“四三方案”。

亿美元增长到 1978 年的 27 亿美元,8 年时间增长了 12.5 倍。

第三,1978—2000 年,在贯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下,“制度红利”不断增强中国经济的对外吸引力,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一方面,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sup>①</sup>从 1978 年的 489 亿美元增长到 2000 年的 12133 亿美元,进出口年均增速(15.7%)较同期 GDP 年均增速(9.7%)高出 6 个百分点。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占 GDP 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13.8%提高到 2000 年的 45%,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获得了全面提升。另一方面,从国际贸易结构上看,依托“人口红利”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中国经济的出口优势开始不断凸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例仅为 1.1%,这不仅显著低于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占比(2.6%),也显著低于拉美(5%)甚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9%)。依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沿海发展战略,“人口红利”优势得到充分释放,中国出口的优势开始逐渐显现。1992 年,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例就首次超过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与东亚、拉美等世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也逐渐缩小。截至 2000 年,中国出口占世界比例为 1.8%,而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上述指标分别为 4.4%、1.6%和 5.7%。此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签订有关保护投资安全的协议,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恢复合法代表权,加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我国引进外资规模逐渐扩大。1982 年,我国 FDI 净流入占世界比例仅为 0.8%,低于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3.7%)、撒哈拉以南非洲(2.8%)和拉美地区(13%)。自 1985 年起,中国的 FDI 净流入超过了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并与拉美地区差距逐渐缩小。截至 2000 年,中国 FDI 净流入占世界比例为 2.9%,而同年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的上述指标分别为 0.4%、0.5%和 5.4%。

第四,随着加入 WTO 对“制度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开放效应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作用充分加强,并于近年来出现积极“再平衡”的新变化。一方面,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2000 年的 12133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48029 亿美元,年均增长 8.4%,而同期中国 GDP 总量则从 2000 年的 26943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22377 亿美元,年均增速 9.3%;进出口贸易增速与 GDP 增速保持相对平衡。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占 GDP 比例呈现出先快速攀升,再积极回调的发展趋势。2000—2006 年,中国进出口占 GDP 比例从 2000 年的 45%提高到 2006 年的 71.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年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的历史峰值。在此之后,随着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内需动能逐渐强劲,进出口贸易增速从 2006 年的 71.4%逐渐回调到 2017 年的 39.2%。其中,出口占 GDP 比例从 2006 年的 38.9%下降到 2017 年的 20.4%,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程度在全球居于中游水平<sup>②</sup>(Li et. al,2018)。另一方面,从国际贸易结构上看,依托“人口红利”优势与“中国制造”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经济的出口优势全面释放。这一时期,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1.8%增长到 2017 年的 12.6%,并于 2015 年达到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的历史峰值(13.1%)。跨国分析表明,中国出口占世界比例自 2003 年就超过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拉美地区,并且随时间推移“中国制造”的出口优势日益明显。例如,就 2003 年而言,中国、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地区的出口占世界比例分别为 5.3%、4%、1.6%和 5.1%,中国较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拉美地区占比偏高 3.7 和 0.2 个百分点;到 2017 年,上述国家和地区出口占世界比例分别为 12.6%、5.1%、1.8%和 5.7%,中国较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拉美地区占比偏高 7.5 和 6.9 个百分点。此外,加入 WTO 以后,中国已成为全球最为开放的“新兴市场”,FDI 净流入占世界比例从 2000 年的 2.9%快速增长至 2014 年的 14.4%,不仅达到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中国引进外资的历史峰值,而且远超同期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3.3%)、撒哈拉以南非洲

<sup>①</sup> 从 1982 年开始,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包括了服务贸易数据统计。

<sup>②</sup> Li et. al (2018)测算了全球最大 30 个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结果发现中国在其中位居第 21 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实际上在全球仅位居中游水平。

(2.3%)和拉美地区(10.8%)的相关指标。自2015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与OFDI的加快,中国FDI从高位逐渐回调,但始终是全球最具外商投资吸引力的新兴市场。截至2017年,中国FDI净流入占世界比例为8.6%,而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地区的相应指标分别为3.8%、1.3%和8.2%。

综上,通过对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演进趋势的梳理,我们发现:由于“制度红利”对“人口红利”的有效释放,中国逐渐从相对孤立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隐士”转变为了全球化发展的“优等生”,开放效应对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 (二) 学习效应带来的自主创新

现有文献表明,随着“人口红利”从峰值向中后期转型,以及现有劳动力资源从低效率生产部门向高效率生产部门转移的基本完成,“制度红利”已使得“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TFP提升的拉动作用充分释放(Li et al,2012)。在此基础上,经过40年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经济通过开放效应对现有劳动力资源的“挖潜”作用已经不大,人力资本与人均GDP的线性拟合已逼近跨国回归的均值水平(Li et al,2017)。在此阶段,中国经济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通过人力资本培育、创新驱动加快知识生产,通过学习效应进一步延长“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

基于跨国比较,表9给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在人力资本、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上的统计结果。从中,我们有如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第一,中国的人力资本、创新与技术进步已逼近或超过中高等收入国家的现有水平。随着中国人均GDP达到中高等收入国家水平(3896—12055美元),中国在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等方面,也达到了与该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标准。具体而言,在教育人力资本方面,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sup>①</sup>达到了51%,仅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2.1%)偏低1.1个百分点,而教育公共支出占GDP比例为(4.1%),仅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3%)偏低0.2个百分点。在健康人力资本方面,201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6.4岁,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75.5岁)高出近1岁,而营养不良发生率中国为8.7%,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略高1.3个百分点。此外,在创新与技术进步方面,2017年中国每百万人中R&D人员数量为1206人,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267人)偏低4.8个百分点;2017年中国研发强度为2.1%,已超过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7%)0.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中高等收入国家群体中,“中国创新”的存量规模优势已十分明显。2017年,中高等收入国家接受的知识产权服务费为71亿美元,而中国就达到了48亿美元,占中高等收入国家总量的67.6%;同年,中高等收入国家支付的知识产权服务费为528亿美元,中国这一指标为287亿美元,占中高等收入国家总量的54.4%。

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本、创新与技术进步与世界前沿水平的差距仍然巨大。我们发现,尽管按2013—2018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速(6.4%),中国人均GDP预计将于2022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2056美元及以上),但中国人力资本、创新动能与高收入国家的相应标准仍相差甚远,与世界前沿水平则存在更大差距。具体而言,在教育人力资本方面,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51%)与高收入国家(77.1%)相差26.1个百分点,与经济前沿水平的美国(88.8%)更是相差37.8个百分点。在教育公共支出占GDP比例方面,中国仅为4.1%,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是5.3%、美国与欧盟分别为5.2%和5.1%。考虑到2017年中国GDP存量水平已达到122377亿美元,教育质量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我国年均教育公共支出至少需增加1469亿美元。在健康人力资本方面,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6.4岁)较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0.5岁)偏低4.1岁,较美国(78.5岁)、欧盟(81岁)分别偏低2.1岁和4.6岁;在营养不良发生率上,中国(8.7%)较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7%)高出2.2倍,也较美国(2.5%)、欧盟(2.5%)高出2.5倍。在创新动能上,中国每百万人中R&D人员数量(1206人)仅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sup>①</sup>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标准,高等教育入学率是指在全部劳动适龄人口中,在高中毕业5年后人群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占比。

平(4042 人)的 29.8%，世界技术前沿的美国(4313 人)在相应指标上较中国高出 2.6 倍。在研发强度上，中国(2.1%)与较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5%)相差 0.4 个百分点，研发效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年均研发支出至少需增加 490 亿美元。

综上，通过对人力资本、创新动能的跨国比较，我们发现：作为一个中高等收入国家，中国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创新与技术进步水平已达到或接近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平均水平。这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年的经济发展，前期释放的“制度红利”对“人口红利”的挖潜作用已经基本完成。考虑到“人口红利”从峰值向中后期转型，以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创新动能与世界前沿水平的较大差距，为进一步推动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投入增长，通过学习效应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改进空间。

表 9 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2017 年)

指标	中国	中高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美国	欧盟
Panel A. 人力资本					
高等教育入学率(%)	51	52.1	77.1	88.8	68.4
教育公共支出占 GDP 比例(%)	4.1	4.3	5.3	5.2	5.1
预期寿命(岁)	76.4	75.5	80.5	78.5	81.0
营养不良发生率(%)	8.7	7.3	2.7	2.5	2.5
Panel B. 创新与技术进步					
每百万人中 R&D 人员数量(人)	1206	1267	4042	4313	3749
R&D 支出占 GDP 比例(%)	2.1	1.7	2.5	2.7	2.0
接受的知识产权服务费(亿美元)	48	71	3458	1284	1293
支付的知识产权服务费(亿美元)	287	528	3247	513	1914

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 六、结论

综合运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等多种宏观数据，本文对新中国 70 年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演化趋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市场经济的“制度红利”与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机制。新中国 70 年来，经济发展质量经过了多次起伏，总体呈现前 30 年低位震荡、后 40 年中高速增长的发展特征，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是否能够有机地叠加在一起。由于未充分考虑到比较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 30 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阶段的错误战略选择，致使“制度红利”缺位，“人口红利”未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此同时，“一五”计划与国民经济调整与恢复时期，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劳动力积极性的相对重视，则使“制度红利”促进“人口红利”有效发挥，实现上述阶段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之所以能够持续跃升，则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国企改革以及加入 WTO 等一系列制度变革息息相关。正是“制度红利”的充分释放，中国一直以来拥有的“人口红利”潜能得到了充分释放，并通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经济结构改善、对外开放的技术吸收等效应，实现了经济发展质量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式进步。

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首先，为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一方面经济政策重心要尽快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中立政策，要通过打破市场垄断、保护知识产权、优化公共服务等手段，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减少政府政策对于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通过校正补贴、税收优惠的偏移，使市场主体能够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破除进入-退出壁垒，优化土地、金融、人才等关键性要素的市场配置。其次，为更大程度发挥“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要进一步突破“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各类政策限制。一方面，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提高总和生育率；另一方面，要消除教育、社保、医疗等关键资源上的城乡二元差异，通

过全面户籍改革减少人口配置扭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此外,面对逆全球化趋势,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长期存在的现实,中国一定要坚持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政策,使“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长期延续,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向高收入国家赢得更大的空间。

#### 参考文献:

- [1] 蔡昉,2013:《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第11期。[Cai Fang, 2013, Understand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Based on a Perva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Growth,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1.]
- [2] 曾璧钧、林木西,1990:《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Zeng Bijun and Lin Muxi, 1990, New China Economic History (1949~1989), Beijing, Economic Daily Press.]
- [3] 钞小静、任保平,201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第4期。[Chao Xiaojing and Ren Baoping, 2011, Analysis of Time Series Chang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
- [4] 程虹、李丹丹,2014:《一个关于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一般理论——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解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Cheng Hong and Li Dandan, 2014,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Quality of Macroeconomic Growth—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Microscopic Products,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
- [5] 程虹、许伟,2016:《质量创新战略:质量管理的新范式与框架体系研究》,《宏观质量研究》第3期。[Cheng Hong and Xu Wei, 2016, Quality Innovation Strategy: A New Paradigm and Framework System for Quali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 3.]
- [6] 代谦、李唐,2009:《比较优势与落后国家的二元技术进步:以近代中国产业发展为例》,《经济研究》第3期。[Dai Qian and Li Tang, 2009,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Binar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Backward Countries: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Industry as an Example, *Economic Research*, 3.]
- [7] 邓小平,200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Deng Xiaoping, 2001,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ume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8] 丁冰,2009:《新中国工业建设:六十年铸就辉煌》,《红旗文稿》第20期。[Ding Bing, 2009, New China's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60 Years of Glory, *Red Flag Manuscript*, 20.]
- [9] 傅元海、叶祥松、王展祥,2014:《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基于动态面板的经验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Fu Yuanhai, Ye Xiangsong and Wang Zhanxiang, 2014, "Pathway Selection fo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Optimization—Experience Analysis Based on Dynamic Panel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9.]
- [10] 傅元海、叶祥松、王展祥,2016:《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经济研究》第8期。[Fu Yuanhai, Ye Xiangsong and Wang Zhanxiang, 2016,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Efficiency Improvement,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8.]
- [11] 葛顺奇、罗伟,2015:《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Ge Shunqi and Luo Wei, 2015, "The Entr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ructur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Economic Research*, 11.]
- [12] 黄菁、赖明、勇王华,2008:《FDI在中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考察》,《世界经济研究》第10期。[Huang Jing, Lai Ming and Yong Wanghua, 2008,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in China: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World Economic Research*, 10.]
- [13] 简泽、张涛、伏玉林,2014:《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经济研究》第8期。[Jian Ze, Zhang Tao and Fu Yulin, 2014, Importation Libera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Local Enterprises—Based on a Natural Experiment of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8. ]
- [14] 李金华,2019:《新中国 70 年工业发展脉络、历史贡献及其经验启示》,《改革》第 4 期。[Li Jinhua, 2019, The 70 Year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New China,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nd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Reform*, 4. ]
- [15] 林毅夫,2019:《新中国 70 年发展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宏观质量研究》第 1 期。[Lin Yifu, 2019, The 7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and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Modern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 1. ]
- [16]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出版社。[Lin Yifu, Cai Fang and Li Zhou, 1999, China's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 updated edition) ,Shanghai, Sanlian Publishing House. ]
- [17] 刘国光,2006:《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Liu Guoguang, 2006, China's Ten Five-Year Plan Research Report",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 [18] 毛其淋、盛斌,2012:《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季刊)》第 1 期。[Mao Qilin and Sheng Bin, 2012, Foreign Economic Openness, Reg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conomics (Quarterly)*, 1. ]
- [19] 任保平、张倩,2019:《西部大开发 20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经验与转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Ren Baoping and Zhang Qian, 2019, The Achievements, Experienc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 the 20 Years of Wester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 ]
- [20] 苏星,1999:《新中国经济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Su Xing, 1999: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s Economy, Beijing, CPC Central Party School Press. ]
- [21] 汪海波,1999:《我国工业发展 50 年的历程和成就》,《中国工业经济》第 9 期。[Wang Haibo, 1999, The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50 Year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9. ]
- [22] 汪海波、董志凯,1995:《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58—1965)》,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Wang Haibo and Dong Zhikai, 1995, The History of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of China (1958—1965), Beijing,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
- [23] 王家庭、李艳旭、马洪福、曹清峰,2019:《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动能转换:资本驱动还是技术驱动》,《中国工业经济》第 5 期。[Wang Jiating, Li Yanxu, Ma Hongfu and Cao Qingfeng, 2019,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pital Driven or Technology Driven,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5. ]
- [24] 卫兴华,2012:《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经济问题》第 12 期。[Wei Xinghua, 2012, Common Wealth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Economic Problems*, 12. ]
- [25] 文东伟,2019:《资源错配、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制造业的增长潜力》,《经济学(季刊)》第 2 期。[Wen Dongwei, 2019, Material Mismatch,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Potential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conomics (Quarterly)*, 2. ]
- [26] 武力,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论析》,《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1 期。[Wu Li, 199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ast 50 Years,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1. ]
- [27] 武力,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Wu Li, 1999,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 [28] 赵德馨,198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Zhao Dexin, 1989,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7~1984), Zhengzhou, Henan, 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The Central Research Of-

- off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94: Selected Works of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 [30] 周一星,1988:《中国城市工业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的关系》,《经济研究》第5期。[Zhou Yixin, 1988,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Output Level and Urban Scale in Chinese Citie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 ]
- [31] Alder S. , L. Shao and F. Zilibotti, 2016, 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 Panel of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1(4), 305-349.
- [32] Benhabib J. , J. Perla and C. Tonetti, 2014, Catch-up and Fall-back Through Innovation and Imita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1), 1-35.
- [33] Blecker R. A. and A. Razmi, 2010, Export-Led Growth,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Handbook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34] Bloom D. E. and J. E. Finlay , 2009,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4(1), 45-64.
- [35] Bloom, David E. ,Finlay, Jocelyn,2009,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4(1).
- [36] Brandt L. , D. Ma and T. Rawski, 2014, 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2(1), 45-123.
- [37] Brandt L. , J. Van Biesebroeck J. , L. Wang and Y. Zhang , 2017,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9), 2784-2820.
- [38] Brandt L. and X. Zhu , 2010,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Working Papers*, 1-59.
- [39] Chong-En B. and Q. Zhenjie, 2010, Th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1978-2007,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4), 650-670.
- [40] Comin D. and B. Hobijn, 2010, An Exploration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5), 2031-59.
- [41] Fang Cai, 2010,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0), 107-119.
- [42] Fung A. , 2006, Varieties of Participation in Complex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 66-75.
- [43] Garnaut R. , 2010,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3(2), 181-190.
- [44] Gerschenkron A. ,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
- [45] Hesketh, T. , L. Lu and Z. W. Xing, 2005, The Effect of 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after 25 year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3(11), 1171-1176.
- [46] Keynes J. M. ,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Cambridge Press*, 1971-1979.
- [47] Khandelwal A. K. , P. K. Schott and S. J. Wei, 2013,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69-95.
- [48] Khandelwal, A. , P. K. Schott and S. J. Wei, 2011,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42.
- [49] Knight J. ,Q. Deng Q. and S. Li , 2011, 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u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ur Surplu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4), 585-600.
- [50] Koopman R. , Z. Wang and S. J. Wei , 2012,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9(1), 178-189.
- [51] Lau L. J. , X. Chen , L. K. Cheng , K. C. Fung, Y. Sung , C. Yang and Z. Tang, 2007, Non-Competitive Input-Output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China-US Trade Surplus, *Social Sciences in Chi-*

- na, 5, 91—103.
- [52] Lau L. J., Y. Qian and G. Roland, 2000,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1), 120—143.
- [53] Lewis W. A., 1954,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4] Li H. B. and L. Tang, 2018, China's Manufacturing Firms Under Trade War, *Working Paper*, 1—45.
- [55] Li H., L. Li, B. Wu and Y. Xiong, 2012, 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 57—74.
- [56] Li H., P. Loyalka, S. Rozelle and B. Wu, 2017, Human Capital and China's Futur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1), 25—48.
- [57] Li H. and L. A. Zhou,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0), 1743—1762.
- [58] Lin J. Y., 1998, How Did China Feed Itself in the Past? How Will China Feed Itself in the Future? CIMMYT.
- [59] Lin J. Y. and Y. Yao, 2001, Chines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143—195.
- [60] Loren Brandt, V. B. Johannes, W. Luhang and Z. Yifan, 2017,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9), 2784—2820.
- [61] Loren Brandt, V. B. Johannes and Z. Yifan, 2012,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 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 (2), 339—351.
- [62] Maddison A.,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 [63] Morris I., 2011,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64] Peng X. 2011, 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Science*, 333(6042), 581—587.
- [65] Qian Y. and B. R. Weingast, 1997, Institutions, State Activ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State-Owned and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254—275.
- [66] Rodrik D., 2006,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China & World Economy*, 14(5), 1—19.
- [67] Rosenstein—rodan P. N., 1956, *Disgusted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in Agriculture*, MIT Press.
- [68] Rostow W. W., 1960, *The Five Stages of Growth—A Summ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9] Schultz, T. P. and Y. Zeng, 1995, Fertility of Rural China Effects of Local Family Planning and Health Program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8(4), 329—350.
- [70] Wang, C. 2012,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1970—2010. *Contraception*, 85(6), 0—569.
- [71] Wei S. J. and Z. Xie and X. Zhang, 2017, From 'Made in China' to 'Innovated in China': Necessity, Prospect,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1), 49—70.
- [72] Wei S. J. and X. Zhang, 2011, Sex Ratios,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44.
- [73] Wei S. J. and X. Zhang, 2011,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 511—564.
- [74] Xing Y. and N. C. Detert, 2010, How iPhone Widens the US Trade Deficits with PRC, *GRIPS Policy Researc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10—21.
- [75] Yao Y., 2014, The Chinese Growth Miracle,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B, 943—1031.
- [76] Yao Y. and M. Zhang, 2011, Sub—national Lead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Working Paper*, 1—43.
- [77] Young A. 1998, Growth Without Scale Effec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1), 41—63.
- [78] Zheng T. and X. Wang and H. Guo, 2009, Estimating forward—looking rules for China's Monetary Policy: A re-

gime—switching perspective,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3), 47—59.

[79] Zhu R., 2011,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in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During 1995—2002, *Economics Letters*, 113(1), 84—87.

##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70 Years of New China: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dividend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Cheng Hong and Gao Shiya

(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Hubei Wuhan)

**Abstract:** As the developing economy which has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has provided a valuable natural experiment.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ast 70 years of New China, this paper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institutional dividend”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of labor supply are both important factor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y are difficult to play a role isolated. Only when the “institutional dividend”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re superimposed, which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comprehensive using the long|term cross|border data from China and other major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trend of change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measured by relative growth rate of GDP,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low|level oscill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o the balanced growth,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have gradually become optimized, also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learning effe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emerging. Therefo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needs to fully release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by “institutional dividend”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through further refor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70 years of New China; institutional dividend; demographic dividend; dynamic mechanism

■ 责任编辑 邓悦